**以史实为据窥探历史的背面**

**——评《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第二小组**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曾发表过一个名为“考史与释史是历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的演讲[[1]](#footnote-1)，阐述了历史研究的两个核心方面——考据历史与解释历史——这二者缺一不可。长久以来，解释历史似乎总能更加引人注目，更能得出些石破天惊的论断。但仅仅释史是不完全的，只有对历史加之以考据，束之以逻辑，才能稳住脚跟。

在《自序》中作者提到，戊戌变法这段历史的相关研究，“以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为基础，构建成当前戊戌变法史的基本观点、述事结构和大众认识[[2]](#footnote-2)”。这段话指出，通过研究身为变法当事人的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著述材料，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近代事件，戊戌变法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当完整；但是囿于政治因素[[3]](#footnote-3)，今天能看到的相关核心史料并不完全客观或充分。例如在《戊戌奏稿》中，具有部分出于政治目的而作伪的资料[[4]](#footnote-4)。出于上述原因，作者所研究的《张之洞档案》作为一个观察戊戌变法的新角度，就具有极高的论述价值[[5]](#footnote-5)；能够完善以往史料研究的薄弱点，为戊戌变法提供更加客观翔实的史料基础。

**一 相关史料**

本文从张之洞和康有为在梁鼎芬牵线下的相识、合作办《强学报》[[6]](#footnote-6)，写到他们因办报中学术理念的不同产生分歧（张之洞所属清流，康有为一党最后发展为激进派），最后上升到政治道路上的决裂。此后，张之洞便利用他的庞大的情报网重点关注康有为的行动，尽可能地阻止康有为在地方办报以传播康学的行动，也指示其的各名“住京”密切关注康有为在宫中的行动以及光绪慈禧以及各高层官员对康有为的政治理论的看法，并根据这些情报在保守的情况下指示张之洞“住京”采取一定的遏制行动。但因为书信传输的时间耽搁、书信中的情报的不准确性、张之洞个人性格上的缺陷（自大又不够勇敢）以及朝政的变幻莫测，康学最终还是在京中鼎盛一时，对此张之洞向他的多名亲密幕僚发电表达了他的担忧、无奈。

**二 读后感**

**1、史料详实，考据精深，唯有深入思考方能窥探历史真相**

就以陈宝箴被赐死一事为例。1898年10月6日，因参与戊戌变法失败，陈宝箴父子遭到惩处，被指“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被罢免的陈宝箴离湖南，迁江西。然而，仅在南昌西山住了一年多，陈宝箴猝然去世[[7]](#footnote-7)。

宗九奇曾在《文史资料选辑》[[8]](#footnote-8)发表《陈宝箴之死的真象》一文，扬言慈禧赐死陈宝箴的真相。远传翁的《文录》手稿中的下面这段话是其主要证据：“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率兵弁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岘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匐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

但茅海建教授明确反对这种的观点，并且以逻辑的力量，考史的态度，进行了驳斥。书中写道：“若说慈禧太后的口谕，没有文字记载，松寿曾任总理衙门章京多年，知道清代制度之严，仅凭口谕，又何敢执行？”他直指出了这种论断的关键错误：即便慈禧赐死陈宝箴的谕令是密旨，在清廷也一定会留有不公开的档案记录。而在没有这种档案记录的情况下，就断下论言，难免失去了考史的态度。

**2、新视角带来的新思考**

在阅读本书后，我们发现历史的真相或许与我们所认知的相去甚远。

从茅海建先生所引的部分史料可以预见，康、梁出于政治斗争方面的考虑，对其所为之事有很多辩解甚至作伪的现象。例如，洋务运动持续数年之久才初见成效，却惜败于财政困难，而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如此对比之下，我们也可发现这场维新来得急躁。如此急躁地进行维新，从康梁的著作中，可能将其政治性地辩解为觉醒，可能将这场革命的失败，归咎于腐败的清廷、相护的官僚、无能的皇帝。但在《张之洞档案》中，我们还能发现来自维新带头人康梁两人的不足。康梁两人所倡导的改革方案，是否实为雅各宾主义思想，我们且暂不提，但其实际成效，不过是搅得都城漫天风雨。

事实上，张之洞和康有为在政治思想和对国家形式的认识上有很多一致，而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其实是张之洞的“坐京”之一，而张之洞在知道杨锐被捕后也是极力营救，但这部分在康有为的记录中却成了张之洞主动请杀六君子[[9]](#footnote-9)；张之洞和康有为不合，学术分歧只是其中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政治上的分歧，他们所持观点策略、主持者的不同，再加上两者个性过强，这消解了双方合作的可能；另外，张之洞、陈宝箴等人在推动戊戌变法上也倾注了很多心血。

由此看来，无论张之洞对康、梁等人的戊戌变法策略有多少不满，他都不可能如二人所描述的那样是戊戌变法反对者的总头目。康梁一派诸如此类的描述，是把双方学术分歧无限拓展到政治领域的结果。

此外，在学术界的现有研究中，提到张之洞在戊戌变法期间的作为，人们多想到其思想的凝注《劝学篇》，然而本书中张之洞却以实干为代名词，是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政治家及官场老手。如此另辟蹊径的介绍，一方面来自于大量而饱满的关于张氏的史实，另一方面更能看出作者对于“另面”的研究之深刻，也因此给予了读者更多的惊喜。

**3、关于茅海建先生**

从这本书中，除了对历史真相的了解，更多的是看到茅海建先生对历史研究尤其是戊戌变法的诚挚的热爱，在此之前，茅老先生早已研究戊戌变法10年以上。而当他碰到张之洞档案时，对知识、对历史的渴望，让他三番五次躲避到不同的大学去完成自己的学术理想，只为了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戊戌变法的研究之中。对于茅海建先生来说，对历史的热爱和知识的充实，让他在研究戊戌变法的过程中无疑是充满幸福的，而这也是我们应当学习和效仿的精神。

**四 结语**

在《时务报》的考察末尾，茅海建先生透过这错综事件总结到：“康有为及其一派似在政治上相当孤立，清政府中好像没有什么人，尤其是高官，会全力支持他们。康有为的敌人，似乎不仅仅是慈禧太后及其极端保守派。”[[10]](#footnote-10)他看出了维新一派的孤立无援，这暗示了最后的失败。历史事件的命运从来不是偶然，在危机之下，就藏着深深的伏笔。

“毫无疑问，戊戌变法是一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然其时间又极为短暂，跌宕起伏，大升大降；千钧一发之机，婉转曲折之密，似又皆藏于细节之中，有待于后来者去感觉与发现。”[[11]](#footnote-11)茅先生认为，对戊戌变法来说，若不由历史细节入手，反复精思缜量，就不能识其大，见其全。

释史虽然重要，但考史亦是不可或缺的。在这样浮躁的时代，茅先生始终以考史的态度，在历史这广袤无垠的田地间笔耕不辍，还原历史而非肆意解读历史，正是这本书最为触动人心的地方。

1. 2021年10月15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应邀在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考史与释史是历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读业师黄永年先生《唐代史事考释》”为题讲演。 [↑](#footnote-ref-1)
2.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footnote-ref-2)
3. 其一，戊戌变法的时间非常短暂，且真正涉及的人数很少；其二，大多数当事者为避嫌，而没有完整记录或详细回忆；其三，康有为与梁启超的著作之目的并非探讨历史真相，而是服务政治斗争。 [↑](#footnote-ref-3)
4. 台北中研院院士黄彰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孔祥吉、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员陈凤鸣研究指出。 [↑](#footnote-ref-4)
5. 张之洞集团所持的对康、梁的排斥乃至敌对态度得以体现，研究者可以站在这两者之外的立场来看待这次改革运动，较为客观，兼听者明。 [↑](#footnote-ref-5)
6.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footnote-ref-6)
7. 刘梦溪：《陈宝箴系慈禧密旨赐死新证》，近代中国研究。 [↑](#footnote-ref-7)
8. 宗九奇：《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footnote-ref-8)
9.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页 [↑](#footnote-ref-9)
10.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98页。 [↑](#footnote-ref-10)
11.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自序，第8页。 [↑](#footnote-ref-11)